

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第四十三辑 (总第一四三辑)

公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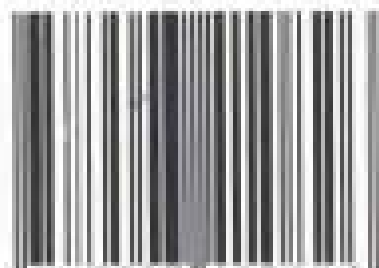
文萃

新青年





ISBN 7-5034-1082-5



9 787503 410826 >

ISBN 7-5034-1082-5/K · 0747 定价: 14.00 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三辑（总第一四三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史资料选辑 第 143 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0.10

ISBN 7 - 5034 - 1082 - 5

I. 文… II. 全… III. 文史资料 - 中国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6174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奥园彩印厂

装 订: 富利装订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875 字数: 210 千字

印 数: 4000 册

版 次: 2000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4.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文史资料选辑》编委会

主 任	朱作霖				
副主任	刘 恕	刘济民	李东海	吴 福	宋 桢
	金开诚	金冲及	龚育之	张文惠 (常务)	
委 员	王庆成	王 晓秋	王楚光	刘景录	李汉秋
	陈 威	陈 砾	陈漱渝	周秉德	弥松颐
	傅璇琮	舒 乙	党德信	马 威	胡太春
	俞兴茂	霍明光	吕长赋		

本辑执行编委 张文惠 俞兴茂

本辑特邀编委 袁 旭

本辑执行编辑 张燕妮

目 录

外交史话

中国驻德军事代表团记事	黄琪翔 (1)
我在国际联盟的外交生涯	吴凯声 (10)
赴外任职见闻	吴凯声 (24)
国民党外交二三事	万亦吾 (40)
1937 年比京九国公约会议回溯	杨荫溥 (50)

耆年忆旧

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的活动	刘王立明 (86)
海外漂泊半世纪 落叶归根话当年	严孔昌 (93)

人物述林

50 年代陈嘉庚先生的两次倡议	张维兹 (100)
黄炎培先生二三事	宋紫云 (106)
华侨代表彭泽民	彭润平 (114)
回忆与梁实秋的交往	于宝桢 (138)

新闻史话

德国海通社在华活动亲历记	刘宗岳 (143)
《救国半月刊》社的内幕	立 言 (153)

回忆广州《新民国报》	高承元 (160)
回忆国民党《华北日报》	曹增祥 (176)
我接办重庆《大公报》的经过	彭革陈 (181)
天津《庸报》	李树芬 俞志厚 (187)
《东南日报》始末	房宇园 严芝芳 (207)

史海钩沉

旧社会县长贪污之黑幕	许 霖 (229)
官僚张绍堂办丧事	傅大兴 (241)
黄百韬的下场	喻梦希 (247)

中国驻德军事代表团记事

黄琪翔*

1945年5月法西斯德国战败投降后，苏、美、英、法四国军队共同占领德国。同年七八月，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后期为艾德礼）举行了波茨坦会议，决定在柏林成立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

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任务是，共同协商处理战后德国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为：解除德国武装，铲除或控制可以作为军事生产的一切德国工业，摧毁国社党及其附属机构，禁止德国军国主义及法西斯主义复活，逮捕及审讯一切战犯，使德国政治生活在民主基础上重新建立，以及有关经济和边界等方面的问题。

早在波茨坦会议以前，6月间，苏、美、英、法四国签定了关于管制德国的联合声明。声明中规定：管制委员会和其他主要有关联合国之间，将借各政府派定的军事代表团以取联络，军事代表团可容许非军人参加，各代表借适当途径与管制机构相互联络。

希特勒政府解体以后，管制委员会成为四国代表执行德国政府职权的临时机构，各国代表团相当于该国派驻德国的临时使节。

* 作者曾任国民党政府驻西德军事代表团团长。

当时德国全部领土由四国军队分别占领。在柏林则以布兰登堡门为界，把市区划成东西两区，东柏林由苏军占领，西柏林由美、英、法军占领。管制委员会的主席由四国军队总司令轮流担任。

根据四国关于管制德国的联合声明，国民党政府派出了以桂永清为首的中国驻德军事代表团。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和美国相互勾结，建立了他们之间的主仆关系。战后，蒋政权对内继续剿共，对外则追随美国。因此，中国驻德军事代表团设于西柏林，并由美军负责供应照顾。

代表团成立初期，除团长桂永清外，外交部派缪培基任副团长，国防部派校级军官三人任团员，连同其他工作人员，共约10人左右。

苏、美、英、法四国对战后管制德国政策问题，一开始便存在着政策的原则分歧。苏联坚持波茨坦协定原则，争取四国合作，行动一致；而美、英、法三国则企图利用法西斯残余势力，阴谋扩张独霸，以达到反苏目的。在管制委员会内，四国各行其是，矛盾百出。在这种情形下，各国代表团无事可做，中国代表团也不例外。桂永清于抗战胜利后被调回国，任海军副总司令。

抗战期间，我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各项军职，在中央做过军委政治部副部长和军训部次长，在前方做过集团军总司令和战区副司令长官，停战后任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我的职务调动频繁，说明蒋介石对我是不信任的。在蒋政府假抗战真反共的环境下，我没有任何工作上的表现。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战结束后，我希望苏、美长期合作，维持世界和平；我也希望国民党和共产党今后长期合作，永远根除内战，共同建立一个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与我的愿望相反，1946年我由云南回到重庆，发觉蒋介石在美国鼓动之下，决心要继续剿共，国共关系紧张，内战危机一触即发。我当时持中间路线政治立场，不可能对于共产党领导的

人民革命战争有正确的认识。尽管当时全国人民已经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起来反对国民党的联美反共政策，但我认为国共关系终将通过协商道路和平解决。我认为内战不是一件好事，以不参加为是，因此采取了逃避现实的态度，决心找机会再行出国。

我和陈诚早在 20 年代便建立了师生关系。当时我任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科的队长，陈诚是我的学生。大革命时代，陈和我都是由第四军起家的，后来陈调往黄埔军校任教官，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抗日战争时期，我和陈诚旧雨重逢，颇为相得。当时陈已是蒋介石的一员宠将，对于安排和笼络保定军校出身的将领方面，具有相当大的权力。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蒋介石的“统一战线”中，我先后做了陈诚的助手。

战后我要求出国的心情，陈诚是理解的，他建议，派我到德国接替桂永清的遗缺，取得了蒋介石的同意。

我做好了出国准备，照例要谒见蒋介石，请求指示工作。某天下午，蒋在他的南京官邸接见了我和我作了一次简单的对话。

蒋：“辞修（陈诚）对我说过了，你去德国很好。……德国话还会说吧？……到那边要注意，千万提防不要上共产党的当，……他们恐怕要利用你的。”

这种突如其来的“委员长训话”，使我摸不着头脑。沉默了一会，我答：“委员长请放心，我想那边不会有中国共产党吧。”

蒋：“唔，还是要注意，他们是无孔不入的。……”

又沉默了一会，我起身问：“委员长还有什么指示吗？”

蒋：“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你和辞修商量商量好啦。”

我告辞而退。

对于蒋介石这次的“临别赠言”，我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这就是他无意中流露出来的对于我这个人的看法吧。无关重要的驻德军事代表团长，他是放心让我干的。现在想起来，也还不止于此。当时正是解放战争转入全面反攻的阶段，形势对

蒋军十分不利，几句话表达出蒋介石害怕共产党的心情。

1947年6月，我带同家属和随员搭德国邮船“大得能”号，由上海启程出国。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第一次流亡德国，1933年福建人民政府运动失败后，次年我再度流亡德国。直到1936年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陈诚打电报邀我，我才回国参加抗战。经过了整整10年的岁月，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抓住“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看待中国的内战问题，又不得不第三次远离祖国，重赴西欧，心情十分沉重。在一个多月的海上生活中，我深深感觉到，法国虽然获得了战胜国的称号，但它被削弱了。船上的一切设备显得穷酸和破烂不堪，船员的生活也十分艰苦。我接触到的西方旅客，包括法国船长和船员在内，一致对战争结果表示失望。他们牢骚满腹地说：“战争，除了美国之外，谁也没有从战争中得到什么好处！”的确，这是第二次大战后，欧洲各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思想。

7月中旬，船抵马赛。我们改乘火车转赴巴黎。在巴黎居留期间，受到了驻法大使钱泰和使馆其他人员有礼貌的招待，并和他们交换了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意见。

8月初，我们到达柏林。在车站迎接我们的有中国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另外还有美军总部交际处负责人。

美军总部交际处为我在西柏林住宅区内安排了一所有现代化设备的住所。

过了几天，我前往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拜会了苏、美、英、法四国军队总司令。当时参加会见的有苏军总司令索柯罗夫斯基元帅，美军总司令格莱上将和政治顾问墨菲先生，英军总司令罗伯逊将军和法军总司令某等。这是一种照例的外交仪式，是我到德国后仅有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管制委员会打过的交道。

苏、美、英、法四国对战后管制德国问题，政策上有原则分歧，已如上述。概括地说：苏联是主张在彻底肃清法西斯势力的

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和平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无疑是符合德国人民的愿望的。但美、英、法帝国主义者则相反，它们认为一个统一的德国势必会反抗它们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奴役，它们害怕战后在东德实施的民主改革，将使德国所有垄断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归于消灭，它们更害怕整个德意志国家的彻底民主化。总之，统一的德国，对于帝国主义者说来，都是不利的，因此它们执行的是分裂德国的政策。在这种有原则性的政策分歧情形下，以苏美为首的东西方阵营对立，斗争十分激烈。

1946年，美、英两占领区宣布实行合并。1947年，美、英两占领区更发展成为美、英、法三占领区，并把西德正式纳入马歇尔计划和“西方联盟”之内，阴谋使西德酝酿成为一个国家。管制委员会的工作陷于瘫痪。

在这种情形下，管制委员会既无事可做，负有与管制委员会联络责任的各国代表团更无事可做，是可以理解的。它们的时间大半消磨在酒会和交际场中，站在旁观者的立场，窃窃私议苏、美关系如何如何，十分无聊。桂永清对代表团长一职味如嚼蜡，原因即在于此。

我到德国后得知，中国代表团的所谓工作，不过是搜罗各种书报杂志材料，加以综合改写，作为情报，按月寄回外交部和国防部报销了事。

代表团成员的待遇优厚，几乎每人都有自己的小洋房和小汽车。他们闲来无事，经常开支公款，到处旅行，优游岁月，享尽“洋大人”的洪福。

在这期间，我走遍了东西德各大城市，它们大都经受过不同程度的战争破坏，断井颓垣，给人以满目荒凉之感，其中除柏林被彻底破坏，几乎令人不能认识之外，东德的文化古城“Dresden”（德勒斯登）和西德莱茵河畔的科伦损害特重。希特勒法西斯给德国人民带来的重灾大难，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时德国经济仍未恢复，城市居民每天仅靠占领国供应的125克面包勉

强维持生命，一根香烟成为莫大的追求对象，一磅黄油抵上了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当年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感不复存在了，在外国人面前，德国人的威风彻底扫地。

在苏、美、英、法四国对德政策针锋相对的情形之下，人们似乎看不到德国的前途，也看不到世界的前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信誓旦旦的所谓合作以及世界永久和平等等好梦，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身居异国，度日如年，我思想上的注意力转而向着国内形势的发展。

1948年春，我读到了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伟大的历史性的文章。文章对国内和国际形势作了十分英明的正确的分析，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文章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的伟大意义时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另一方面，文章又深刻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形势，指出了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组成了帝国主义和反民主阵营，反对世界民主势力，积极准备新的战争，全世界人民对此要有充分的警惕，对打败帝国主义发动第三次大战要有充分的信心。在这种具有无限的感情和理智的语言感染之下，谁能无动于衷呢？我再不能以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中国内战问题了。从这时起，我决心脱离蒋政府，相机回国，投身于中国人民解放运动。

1948年以来，苏、美、英、法由于德国问题所引起的矛盾日益深刻。2月间，在法兰克福（梅茵）举行的美、英会议通过了赋予两占领区各机构以政府性质的决议，事实上已经是一个国家政权机构。法国也参与了这种分裂政策——成立一个与德国其余部分相对立的西德国家的机构。此后，美、英、法三国又背着苏联，举行了有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参加的关于德国问题

的伦敦会议。会议议程中包括属于四国共同管辖范围内的问题：德国在欧洲经济中的地位问题、国际共管鲁尔问题、领土问题、西德未来的政治发展问题等等。这样，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这个机构完全陷于破产，正如当时苏军总司令索柯罗夫斯基在该会某次会议上所说：“作为德国境内一个执行四国对德管制的最高权力机关的管制委员会，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

伦敦会议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1948年6月18日由西方国家所实施的西德单独币制改革。单独币制改革法，制定了一种新的货币——德国马克。从此，德国原有的通用货币被两种不同的货币取而代之了。德国马克在华盛顿印制，没有任何德国代表参加监督，美国当局可以任意发行，结果是美帝国主义者以大量纸币收买了德国人民的财富。在政治上，单独币制改革使划分苏占领区与西方各国占领区的区界，实质上变成了国界。

苏、美、英、法四国关系岌岌不可终日，这就造成了当时震动世界的所谓“柏林危机”问题。

“柏林危机”的发生，直接起因于西德和西区单独币制改革的实施，因为美、英、法三国代表不仅限于实现德国的经济分裂，而且还把这种分裂行动扩展到柏林。它们在柏林发行了自己的单独货币，从而扰乱了该市人民的正常生活。

针对西方国家的分裂和挑衅政策，1948年6月24日，苏联召开了有东欧八个社会主义国家（苏、波、捷、匈、保、罗、南、阿）政府外交部长参加的华沙会议，揭露伦敦会议的目的是要把西德变为重建德国战争潜力的工具，用来达成美、英、法的战略目的。会议拒绝承认伦敦会议的决议有任何法律上或道义上的效力。

与此同时，柏林苏军采取了对策，加强了与西占区的交通孔道的限制措施。在苏区和“大柏林”区严禁西部各占领区所发行的纸币输入。在军事上也采取了应付事变的必要措施。

柏林形势十分紧张，人们把它和第三次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了。

某日，美军政治顾问墨菲以便宴形式邀请驻西区的各国代表团团长于其寓所，就当前局势交换意见，主要集中在会不会有战争危险上面。议论纷纭，莫衷一是。西欧小国如比利时、荷兰、丹麦等国的代表团长，大都面有忧色。我通过译员，以简单的语言表示个人的看法，认为大战时机还没有成熟。墨菲笑对客人们说：“General Huang is an optimist.”（黄将军是个乐观主义者。）我只好一笑置之。

“柏林危机”所反映出来的四国关系，一时确实相当紧张严重，也确实在世界各地掀起了一种“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的幻觉。但我当时认为战机还没有成熟，理由约有下列几点：第一，苏联本身是不需要战争的，它的战胜余威犹在；战后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代表的民主力量也十分强大，它们反对战争，也有决心和力量制止战争。第二，以英、法为首的所谓战胜的西欧各国在战争中被严重削弱了，各国人民和政府都迫切需要和平，医治战争创伤；美国也不敢轻于言战。第三，美国对西欧联盟的军事援助问题，尚未最后决定，它不愿立即负起军事上直接义务和责任，西欧联盟也不愿替美国充当马前卒。正是这些原因，使“柏林危机”终于不过是危机而已。

“柏林危机”期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了决战的阶段。9月间，正当蒋介石军队在山东战场上连战失利，济南失守、王耀武被俘的时候，我忽然接到国防部发来的一封急电，内容是：

“闻柏林形势紧张，冷战有变为热战可能，究竟如何，希速回国报告，中正。”

这封电报的字里行间，生动地描写出蒋介石在剿共战争快要完全失败的情况下，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作为救命符的锅上蚂蚁丑态。

我立刻收拾行装，到荷兰，搭飞机回国，并决心不再回头。

我乘荷兰航空公司的“空中霸王”号飞机，经过了三天航程，10月初到达上海，随即转赴南京，会见了蒋介石。蒋一看

见我，装作很客气的样子，开口即问：

“柏林情形怎么样啦？世界大战快爆发了吧？”

我知道他喜欢听的是什麼，但我没有理由满足他的愿望。我简单地答复说：

“‘柏林危机’似乎快要过去了。苏联和美国都不想打仗。看样子，冷战还会继续下去。”

蒋对此大失所望，脸色变得很难看。他让我喝茶。

不识时务的我，端起茶杯，以和缓的语调大胆进言，说：“委员长，还是以恢复国共和谈为好吧。”蒋默然不答，他哪里还能考虑这个问题呢！他吩咐我：“辞修有病，现在台湾休养，你去看看他吧！”

我知道话不投机，答应回上海后再赴台湾，旋即告辞。

这就是我最后一次与蒋介石见面和脱离他的政权的经过。

我在国际联盟的外交生涯

吴凯声*

1926年，我自欧洲回国，即在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堂，担任了第一任的中国籍律师，并参加有关中国政府收回治外法权方面的各项活动。除此以外，我还担任上海法租界纳税华人委员会的委员，兼任上海很多工会、公司团体的法律顾问。

1928年，我调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当时的外交部长是王正廷）。从此，我开始了外交工作的生涯。

国民政府奠都南京的争论

北伐革命取得胜利后，关于中国在何地建都的问题，一度曾引起一番争论。北伐革命目的之一，是取消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取得外交上的独立自主，这与最后选定建都在南京，也有着一定的联系。

记得有一次，上海总商会曾召开了重要的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我以外交部秘书和上海各界人士法律顾问的身份出席会议。

那次会议出席的主要人物，有上海总商会会长王晓籁以及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如林康侯、袁履登、闻兰亭等人。会上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国民政府应定都何地，也就是迁都南京？还是

* 作者系国民党政府派往国际联盟的首任代表，常驻国际联盟。